

略談黃丕烈舊藏宋刊《陶淵明集》版本

劉 明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版本校勘，論證黃丕烈舊藏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刻於紹興十年之後，以刻工刻書時間的相互推證和字體版式特徵的相似性，認為宋刻陶集刻於明州是可以接受的結論性意見。同時，在吸取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討論了作偽問題，主要表現在妄刻“曾絃書刊”之“刊”字和流傳過程中紙張染色做舊兩個方面，對於深入認識宋刻陶集的版本及浙江刻書的地域性等或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黃丕烈 宋刻遞修本 陶淵明集 刻年 刻地 作偽

2012年是周叔弢先生向國家圖書館捐贈善本古籍六十周年，國家圖書館舉辦了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古籍展，在展覽中展出了宋刻兩陶集，即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和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注》兩部，均為黃丕烈舊藏，至周叔弢精心使兩部陶集珠聯璧合而避免了流散^①。宋刻《陶淵明集》流傳稀見，極具版本價值，建國以來有三位學者在陶集版本的研究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即趙萬里、郭紹虞和陳杏珍三位先生^②，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即以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為研究對象，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略加申說，重新討論了此本的作偽、刻年和刻地等相關問題。

一、黃丕烈舊藏宋刊《陶淵明集》的版本及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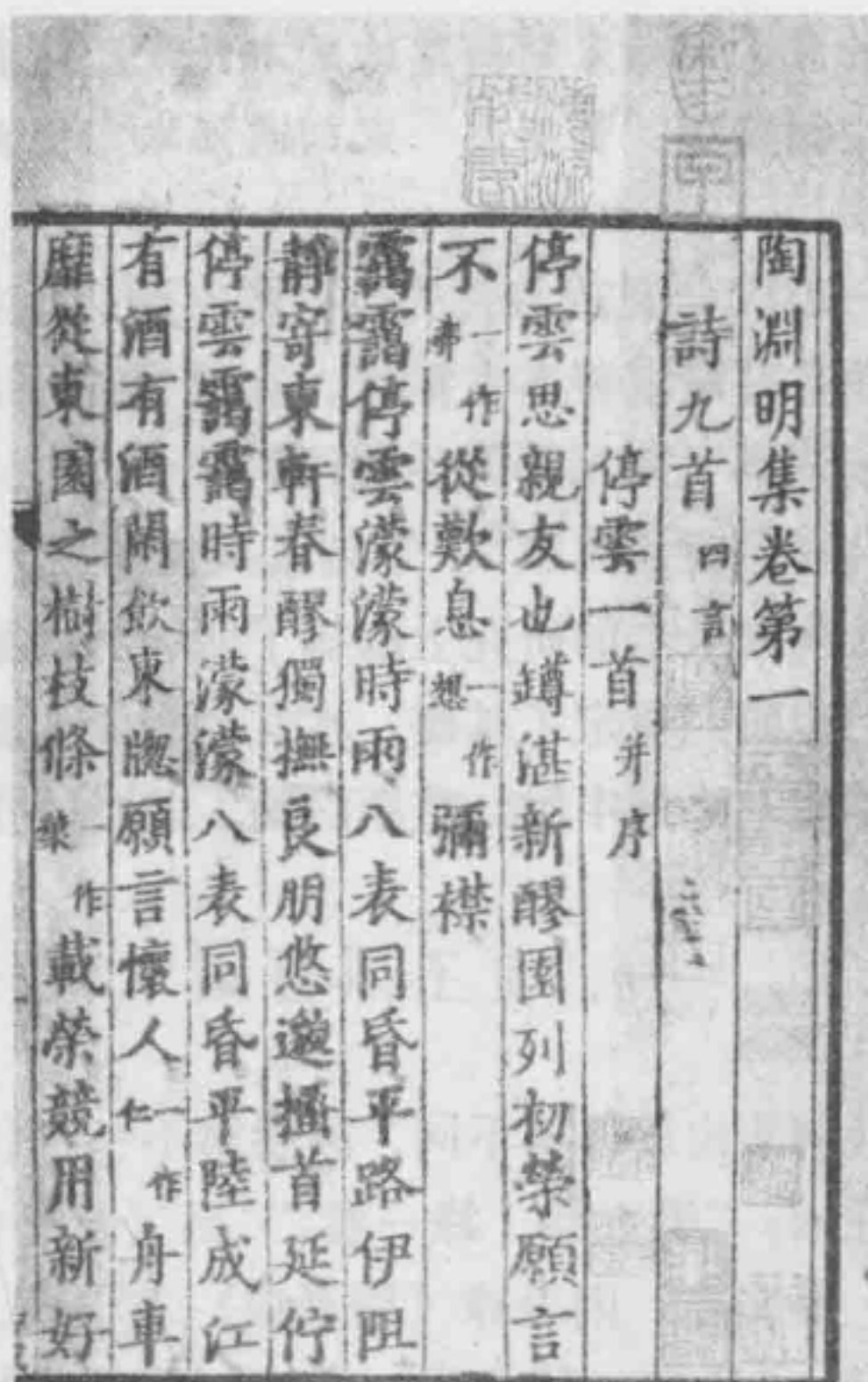
陶集由於傳本不同，故卷第不一，《隋書·經籍志》著錄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小注云：“梁五卷，錄一卷。”至《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陶淵明集》五卷；《新唐書·藝文志》則著錄《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崇文總目》著錄《陶潛集》十卷，《通志·藝文略》著錄《陶潛集》二十卷，正史及官私修藝文志所著錄的陶集有五卷本、九卷本、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之別。

除上述記載外，陶集尚有六卷本和八卷本之別，如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卷末所附北齊陽休之跋云：“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並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所附北宋宋庠跋亦稱：“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筆者注：指《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書》《藝文志》）不同，有八卷本，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

即楊僕射所撰。按吳氏《西齋錄》（筆者注：指唐吳兢《西齋書目》）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知十卷本之第始於北齊陽休之整理本。

北宋時期陶集的傳本，宋庠跋稱有八卷本和十卷本，從“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之語來看似乎流傳並不是太多。舊題蘇寫本《陶淵明集》（此書版本情況詳見本文第二部分）卷末錄有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悅跋，云：“昭明太子舊作纂錄，且傳寫寢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輯，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掇拾眾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終次為一十卷。近年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本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知思悅整理本亦為十卷本。綜上似可推斷《崇文總目》著錄的十卷本陶集，正反映了北宋時期陶集主要傳本為十卷本的客觀情況。至南宋初期，《郡齋讀書志》著錄《陶潛集》十卷，云：“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獨吳氏《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江左名家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③再次印證至南宋初十卷本仍是主要的傳本，從現存南宋初陶集的刻本情況來看，也可以佐證十卷本在當時陶集傳本中的主要地位，如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即為十卷本。還有一部舊題蘇寫本，卷末有紹興十年（1140）佚名跋，稱：“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鋟於木以傳不朽云。”知此舊題蘇寫本的宋刻原本刻於南宋紹興十年，亦為十卷本。上文所提到的舊題蘇寫本，除思悅跋外，卷末還有紹興十年佚名跋，稱：“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鋟於木以傳不朽云。”此舊題蘇寫本的宋刻原本亦為十卷本，且刻於南宋紹興十年。

現存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十卷（右圖所示），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書名題“陶集幾”。卷端題“陶淵明集卷第一”，卷末有北齊陽休之序錄，次本朝宋丞相私記、曾紘說。《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著錄此本為“宋板”，至黃丕烈則稱此本為北宋本，云：“蓋此北宋曾氏刊本也。”^④至《楹書隅錄初編》直接著錄為北宋本《陶淵明集》^⑤。北宋本的定法，得到了一些質疑或修正，如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稱：“前人號為北宋本，然其字體雕工頗與余藏《樂府詩集》相近，或是南宋初杭本。”^⑥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根據書中刻工施章、王伸、洪茂、方成皆為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紹興十七年又刻明州本《徐鉉文集》，補版刻工與明州本《白氏六帖》《文選》六臣注多同，從而認為“毛氏汲古閣秘本書目定為北宋本，



恐不確”^⑦。之後學者如陳杏珍，稱“遺”字闕筆“不是在補版葉，而是在原刻葉上。這一情況說明本書不是北宋刻本。又查書中慎字不缺筆，則此書的版刻年代應在宋孝宗之前”^⑧。丁延峰也根據刻工洪茂、方成見於紹興二十九年（1159）《文選》六臣注修版中，再據《陶淵明集》避諱至高宗止，而認為此本“應是紹興初刻，紹興後期補刻”^⑨。而產生這些糾紛的緣由全在《陶淵明集》卷末所附的那篇《曾紘說》上，為便於說明問題起見，茲附全文如下：

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澹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而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頃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且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公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1124）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刊（筆者按：自標題“曾紘說”至“友人岑”為後人墨筆抄補^⑩）。

黃丕烈當即據“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刊”而稱此本為北宋曾氏刊本，而後楊氏海源閣在著錄時因襲之。但問題在於《讀山海經》中的“刑天舞干戚”，此本仍然作“形夭無千歲”，並沒有改過來，所以即便存在過一個曾紘本，也不能將此本徑稱為曾紘刊本。曾紘，《萬姓統譜》云其為“南豐人，家襄陽，博學善屬文，號臨漢居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所撰《臨漢居士集》七卷，云：“南豐曾紘伯容撰，其父阜子山，於子固為從兄弟。”^⑪曾紘所撰此文令人疑惑之處就在於“曾紘書刊”的“刊”字，黃丕烈稱：“余又見有影寫宋本，但有楊之序錄、宋之私記，而曾說不存，可知此刊之秘矣。”^⑫或許職此之故，黃丕烈大概過於看重了“曾紘書刊”四字在判斷版本中的作用。陳杏珍頗有見地地指出：“此文落款所署曾紘書刊四字不好理解，縱觀全文，也難以得出曾紘刻印陶集的結論。而且將介紹刻書事宜的序文自名為曾紘說，這種情況實屬少見。這個標題不像一般刻書時所印的新序標目，倒很像後人翻刻時所輯錄的前人舊序標目。”^⑬的確如此，從現存文獻資料中難以找到曾紘曾刻陶集的證據，這個“刊”字除了顯得不倫不類之外，還似乎隱約透露出作偽的痕跡。郭紹虞先生《陶集考辨》，可以說成功地解決了“刊”字問題，他說：“刊字蓋出後人妄加，未可謂為刊本之證。”^⑭其根據是宋紹熙三年（1192）曾集刻本《陶淵明詩》中也收錄了此文，無標題，文末題“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正無“刊”字。所以，在陶集刻本中並不存在曾紘本，“曾紘書刊”的“刊”字也應出於後人妄加。

《曾紘說》一文最初的用途，是曾紘寫給范元義說明刊本有誤的，但此宋刻遞修本仍作“形夭無千歲”，繼承了義陽太守公刻本的錯誤，難道此本的底本是北宋宣和六年義陽刻本？義陽即今河南信陽，太守公即王厚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云：“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1122）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為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

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為庾鈞、丙曼容為丙曼客、八及為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⑮知王厚之義陽刻本將其認為的誤字如庾鈞、丙曼客、八友等分別改為庫鈞、丙曼容、八及，檢此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卷六作“丙曼客”，不作“丙曼容”；卷九作“庾鈞”、“八友”，不作“庫鈞”、“八及”，顯示此本的底本並非王厚之義陽刻本。

從曾紘寫給范元義信中所稱的錯誤，並沒有在王厚之刻本中改過，推斷王厚之並未見到曾紘此信，不知道存在諸如“形夭無千歲”之類的刊刻誤字，當然在其刻本中也就絕不會出現《曾紘說》此篇文字。也就是說，最初的《曾紘說》是不會與陶集刻本聯繫在一起的，它只不過是一封友朋之間討論版本問題的私人書信。陳杏珍稱“這個標題不像一般刻書時所印的新序標目，倒很像後人翻刻時所輯錄的前人舊序標目”，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國家圖書館所藏此宋刻遞修本所附的《曾紘說》，正是刊刻時輯錄的前人舊序標目，陶集刻本附《曾紘說》極有可能即始於此本。文獻表明，此後的陶集刻本襲用《曾紘說》，如吳師道《吳禮部詩話》云：“予家淵明集十卷，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時所刊。”^⑯此後的曾集刻本也收錄了《曾紘說》一文，只是沒有題“曾紘說”而已。那麼，此部宋刻遞修本在《曾紘說》的末尾“畫蛇添足”般地加上“刊”字，其用意便值得探究，上文已提到筆者懷疑有作偽的可能。

胡仔稱王厚之刻本“字畫乃學東坡書”，可證傳世的舊題蘇寫本《陶淵明集》，其底本當正是此王厚之刻本。檢舊題蘇寫本《陶淵明集》，所附無《曾紘說》，且卷六正作“丙曼容”，卷九正作“庫鈞”、“八及”，符合王厚之序所稱的改字情況；且《讀山海經詩》也正作“形夭無千歲”。前文已指出此蘇寫本的宋刻原本即紹興十年刻本，實即王厚之刻本的重刻本，佚名跋中所稱群賢校定當主要即指王厚之。此蘇寫本有南宋紹興十年跋，云：“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鋟於木以傳不朽云。”即蘇寫本的宋刻原本是紹興十年刻本，實即王厚之刻本的重刻本，跋中所稱群賢校定主要即指王厚之。大概因北宋末年戰亂，原版不存遂就傳本重刻，胡仔稱“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佐證南宋胡仔之時即已經見不到王厚之所刻的陶集書版子。此宋刻遞修本也是紹興間刻本，不能確定具體的刻年，但通過此宋刻遞修本與蘇寫本的校勘（兩本的版本關係，詳見本文第二部分），會發現此本參校了蘇寫本的宋刻原本，那麼此本應刻在紹興十年之後。

從曾集本的情況來看，曾紘致范元義信的內容，以附注的形式附刻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之後，說明曾紘信與陶集的刊刻沒有必然的聯繫；還可推知宋本陶集就是作“形夭無千歲”，附上曾紘信僅是指出一種意見，但並不打算在正文中更改（曾集本也是作“形夭無千歲”）。對於此部宋刻遞修本來說，曾紘信並沒有置於《讀山海經》之後，而是刻在全書末尾，與北齊楊休之序錄、本朝宋丞相私記相並列，其用意即顯示此本與曾紘之間存在著關係。但刻者並沒有採納曾紘的校勘意見，印證此本的底本亦即作“形夭無千歲”，刻者沒有輕易更改，但又強與曾紘產生刻書上的聯繫，遂別具用

心地刻了一個“刊”字，造成此本乃曾紘所刻的印象。這樣做的目的，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此本刻在蘇寫宋刻原本之後，爲了彰顯此刻的不同，於是精心設計了增刻《曾紘說》。茲檢“刊”字，出現在原刻版葉，且與上文不存在字氣不貫的問題，知紹興間初刻此本時即已刻入曾紘說，而非在紹興後期補刻時加入。綜上，《曾紘說》中的“刊”字是刻者有意作偽的表現，以此來作為判斷此書版本的根據是不恰當的。

而有學者根據此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形夭無千歲”句左側有“刑天舞干戚”，而認為曾紘於宣和六年再次校刊時予以加注持贈，這是曾刻的確證，復據《曾紘說》末句所署，則紹興本出自宣和本更無疑問^⑦。也有學者認同此論，進一步引申稱“南宋紹興本確曾出自曾紘北宋宣和六年刻本，但不是宣和本，而是宣和本的重刻本”^⑧。實際上，“刑天舞干戚”不是刻的，而是後人寫在上面的，目的也僅是注明一種不同的異文，所以不能據此認為曾存在過一個曾紘刻本（筆者注：研究古籍的版本問題，最好還是要經眼原書，僅憑影印本可能會出現失誤，如此處原書本為墨筆所寫的“刑天舞干戚”，在影印本中則容易造成也是刻印的假象）。

除了“曾紘書刊”牽涉作偽外，此書在後世流傳過程中也有作偽的痕跡，周叔弢曾有所揭示。1983年約六月，周叔弢寄家書，談影印善本古籍事，提到：“《陶淵明集》首行挖補，汲古閣諸印皆偽，似不可列入甲等。”^⑨周叔弢根據挖補和鈐印情況，已懷疑卷端首葉存在作偽。筆者根據體會，試描述如下。

書中卷端題名“陶淵明集卷第一”係後人墨筆補寫，原刻字紙已佚去，係後來補紙。從題名一格鈐黃丕烈印來看，則當黃氏時已如此，墨筆補寫出於何人手筆不可考。從紙色來看，題名一格與詩九首一格有明顯差異，前者紙色淺黃色，後者則深黃色。紙色呈深黃者又見於第九行“閑飲東牕”處和第十行“靡從東園”至“競用新好”一格。第三行如“停雲一首”處，左半呈淺黃色，右半呈深黃色。而“停運一首”四字為原刻印字，並不存在補寫。此格的紙亦係原紙，也不存在補紙的情況。知深黃色和淺黃色兩種紙色，其中一種出於染色。細諦卷端題名一格，會發現大體呈淺黃色，但上下又略有差異。“陶淵明集第一”補寫處紙色淺於其下，題名一格和第二、三、四格的右下角部分係補紙，並非原書紙，補紙與原書紙的接痕清晰可見。為使補紙不輕易看出來，遂將與之相鄰的第二格和第三格右半部染色，同時又將第九格的“閑飲東牕”處和第十行“靡從東園”至“競用新好”一格染色，均染色為深黃色，與補紙的顏色大致區別開。而自第三格左半部至第九格除“閑飲東牕”處外均為淺黃色，與補紙的顏色相近，此近七格的淺黃色不僅占了此書葉的絕大部分，而且應是原書葉的顏色。這樣一來，看此卷端第一葉，視線很自然地落在了淺黃色的卷端題名第一格和第三格右半部至第九格部分，而造成深黃色的第二格、第三格右半部和第十格為原紙，淺黃色部分為補紙。實際上，補紙只存在於卷端題名第一格等地方，原紙和補紙的混淆，目的是轉移對卷端題名係出自後人補紙補寫的注意力，同時也轉移了補紙與原紙之間接痕的注意力。爲了進一步轉移注意力，在卷端題名一格和第二格的原紙、補紙接痕處自上而下鈐蓋“宋本”、“甲”、“毛晉之印”、“百宋一廬”、“臣紹和印”五印，恰好蓋住接痕，強烈造成與後面的淺黃色部分不是同紙而為原紙的錯覺。這麼費盡心機

地去做，無非就是掩蓋卷端題名出於補寫的事實。這是通過紙張染色移花接木來掩蓋補紙的實例。

再來談談此部宋本的刻地問題。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將此本置於浙江紹興刻書中，但又據刻工刻過明州本《徐鉉文集》，補版刻工與明州本《白氏六帖》《文選》六臣注多同，“因疑此本亦當為明州本”^⑩。陳杏珍也同樣根據刻工與刻及版式情況，認為“《陶淵明集》可能也是明州刻本”^⑪。我們還是根據刻工的情況，再略加贅敘，書中原版刻工有方成、黃暉、王伸、王寔、王雄、施章、張逢、吳珪、洪茂和陳俊共計十位，其與刻情況如下表所示：

刻工	刻書情況	刻地
方成	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書中“慎”字不缺筆，應是紹興刻本）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黃暉	《尚書正義》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宋紹興二至三年（1132—1133）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資治通鑑》	紹興
王伸	《尚書正義》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紹興十七年（1147）明州本《徐鉉文集》	明州
王寔	《尚書正義》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王雄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施章	《尚書正義》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宋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唐書》	紹興
張逢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吳珪	《尚書正義》	紹興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唐書》	紹興
洪茂	《尚書正義》	紹興
	宋紹興九年（1139）紹興府刻《毛詩正義》	紹興
	宋紹興十六年（1146）兩浙東路茶鹽司刻《事類賦注》	紹興
	紹興十七年（1147）明州本《徐鉉文集》	明州
	明州本《文選》（初刻本）	明州
陳俊	宋光宗浙刻本《論衡》	不詳

從上表可以看出，刻工施章、王仲、洪茂、方成雖皆為南宋初年杭州刻工，但刻書又不僅限於杭州，而是在紹興、明州（今浙江寧波）等地都曾參與過刻書。以有明確紀年的刻書為例，紹興二至三年，黃暉已在紹興開始刻書；紹興九至十六年，洪茂在紹興刻書，至十七年又至明州刻書；紹興十七年，王仲也已至明州刻書。明州本《文選》，卷末有紹興二十八年（1158）補版的記載^②，冀淑英先生認為：“據寶慶《四明志》，直閣趙公名善繼，趙以直秘閣紹興二十八年知明州，二十九年（1159）六月罷任。因知《文選》刻版當在南宋初年，修版則在紹興二十八年趙善繼知明州時，與盧欽題記相合。”^③表中所列明州本《文選》即為初刻本，現藏日本足利學校，則其刻年應在紹興二十八年之前。知方成、洪茂、黃暉、王仲、王寔、王雄、施章、張逢、吳珪皆至遲在紹興二十八之前便已到明州刻書。上文已提到，此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刻於紹興十年之後，其刊刻的時間斷限為紹興十年（1140）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紹興十七年有兩位刻工即洪茂和王仲已在明州刻書，而洪茂紹興十六年還在紹興從事刻書業，故可斷定明州本《文選》初刻時間當在1147至1158之間的十二年內。假如陶集刻在杭州，那麼至少在1140至1147年的七八年間上述十位刻工須均在杭州從事刻書業，這顯然與洪茂1139年在紹興、1146年在紹興、至1147年到明州相矛盾，因而佐證陶集也只能刻在明州。

宿白先生就南宋初年杭州地區刻工的流動，指出約自紹興中葉以後，杭州刻工開始大量支援江浙其他地區，特別是各地的官府雕版^④。一般而言，刻工大致的流動路線是自杭州出發，東行至紹興、明州，再南行至台州、溫州等地。以表中刻工而言，黃暉在1132至1133年即在紹興刻書，除刻《資治通鑑》外，還刻了《尚書正義》，大概就是紹興本地的刻工，後來又至明州參與刊刻《文選》，相距紹興刻書時間大致為15至26年。以刻工工作三十年計算，也還能繼續從事刻書業。再如刻工施章，在紹興刻完《唐書》《尚書正義》後，即在明州與刻《文選》，初刻和補版都參與過^⑤，而補版在紹興二十八年至孝宗朝，大概在明州從事刻書的時間是比較長的。故結合有明確紀年的另外兩位刻工王仲、洪茂來看，要想完成《文選》的刊刻，必須集中在1147至1158年間，這既符合刻工的流動路線，也與紹興等地的刻書活動結束集中在明州相契合。同樣，另

外五位刻工方成、王寔、王雄、張逢和吳珪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參與《陶淵明集》



刊刻的十位刻工有九位在此時間段內是在明州的。刻工陳俊除刻此陶集外，還參與了宋光宗時《論衡》的刊刻，則其開始刻書的時間也應在紹興後期，而不太可能在紹興十年至紹興十七年之間。所以，紹興後期在上述刻工聚集明州刻《文選》的同時，又刻了《陶淵明集》，是符合刻工工作的實際情況的。故經刻工刻書時間的相互推證，認為《陶淵明集》刻在明州是站得住腳的。

再來看看版式，陳杏珍指出紹興二十八年開始修版的明州本六臣注《文選》（上頁圖所示）、明州刻本《白氏六帖》，其版式與此《陶淵明集》“相似”，推斷也可能是明州刻本^②。從版式及字體槧法來看，明州本六臣注《文選》與《陶淵明集》均極為相似。一般而言，南宋紹興間杭州刻本的字體端整遒勁，而明州刻本除保留杭州本刀法遒勁的特點外，在端整上力求舒展，從端麗向流麗變化。

綜上，從刻工和字體版式的角度斷定《陶淵明集》刻在明州。

二、《陶淵明集》與舊題蘇寫本的版本關係

舊題蘇寫本的版本情況描述如下。《陶淵明集》十卷，清嘉慶十二年（1807）魯銓刻本^③，九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書名題“陶卷幾”。卷端題“陶淵明集卷第一”。書中有內扉頁，題“蘇東坡書陶淵明集，京江魯氏藏板”。卷首有總目，卷十末鐫“江右方又新、又可全刻字”字樣。卷末有北齊陽休之序錄，次本朝宋丞相私記、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悅《書靖節先生集後》、紹興十年（1140）佚名跋，次嘉慶十二年魯銓跋，次甲戌（1694）毛扆跋。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2冊。

按書中魯銓跋云：“丁卯歲，余攝監司事，於鳩茲購得此本，乃琴川毛氏鑒定，而倩其師梅仙錢君重摹付刊者。蘇文忠書，結構遒勁，直入王僧虔之室。”據“蘇文忠書”，而將此本稱為仿宋刻本，如《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一帙“嘉靖十三年魯氏刻仿宋東坡手書本”^④，實即此本，而將“嘉慶十二年”誤為“嘉靖十三年”。魯銓所據底本為毛氏影刻本，而毛氏則據錢曾藏本翻刻，而錢曾本又是翻自宋版，《讀書敏求記》著錄，稱“購名手從宋刻影摹者，筆墨飛動，行間字有不可遏之勢，視宋刻殆若過之。”^⑤校證引勞權語稱文休承定為蘇東坡書，又錢謙益《跋坡書陶淵明集》亦稱：“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為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雄秀，絕似司馬溫公墓碑，其出坡手無疑。鏤版精好，精華蒼老之氣凜然於行墨之間，真希世之寶也。”^⑥毛扆翻刻經過，其跋所述甚詳，云：“一日晤錢遵王，出此本示余，開卷細玩，是東坡筆法，但思悅跋後有紹興十年跋，知非北宋本矣。而筆法宛是蘇體，意從蘇本翻雕者”，“業師梅仙錢先生書法甚工，因求手摹一本。”據書末所附跋語，又書中還照舊保留諱字，如卷一《贈長沙公族祖》詩“允構斯堂”句，“構”字闕筆；同詩“載驚秋霜”句，“驚”字闕筆；同詩“敬哉離人”句，“敬”字闕筆等，故此本當出於宋槧舊本。

書中除載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外，尤為注意者又錄北宋治平三年思悅書和紹興十年佚名跋。思悅其人，《直齋書錄解題》云：“思悅者，不知何人也。”^⑦盧文弨校

注引趙瞰江語云：“思悅，宋虎丘寺僧。”思悅書云：“愚嘗掇拾眾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泊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終次為一十卷”，知北宋時曾存在一個思悅本陶集，《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著錄《陶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辨證》一卷、《雜記》一卷，注云：“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蜀人張縝季長辨證之，又雜記前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②此條緊接“陶淵明集十卷”條，疑原為一條，後世傳本誤分，知蜀中曾刊刻思悅本《陶淵明集》。上文根據王厚之序中所提到的改字與此蘇寫本一一相合，而斷定蘇寫宋刻原本實出自王厚之刻本，至紹興十年重刻時輯錄了陽休之、宋庠、思悅諸家之跋。即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與此蘇寫本而言，有學者認為宋刻遞修本陶集“不錄思悅《書後》，比蘇寫本更接近宋庠本原本，是今存宋代刻本最善之本”^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三帙宋刻本陶淵明集，蘇寫本的宋刻原本與上述三本屬不同版本系統，故仍具版本價值。

茲以卷一至三校勘為例，揭櫫蘇寫宋刻原本與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之關係。為了表述的方便，清嘉慶十二年魯銓刻蘇寫本簡稱“魯銓本”，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簡稱“宋刻本”，校勘舉例如下：

（一）兩本有異文者

卷一《停雲》詩，魯銓本“樽湛新醪”，宋刻本“樽”作“罇”；魯銓本“歎息彌襟云爾”，宋刻本無“云爾”兩字；魯銓本“枝條再榮”，宋刻本“再”作“載”。魯銓本“競用新好”，宋刻本“競”作“競”。《時運》詩，魯銓本“慨獨在予”，宋刻本“予”作“余”。《贈長沙公族祖》詩，魯銓本“於穆令祖”，宋刻本“祖”作“族”；魯銓本“實宗之光”，宋刻本“實”作“寔”；魯銓本“貽此話言”，宋刻本“此”作“茲”。魯銓本“終焉為山”，宋刻本“焉”作“在”；魯銓本“臨路淒然”，宋刻本“淒”作“悽”。《酬丁柴桑》詩，魯銓本“惠于百里”，宋刻本“惠于”作“于惠”。《勸農》詩，魯銓本“趣時競逐”，宋刻本“趣”作“趨”、“競”作“競”；魯銓本“歲莫奚冀”，宋刻本“莫”作“暮”；魯銓本“儋石不儲”，宋刻本“儋”作“檐”；魯銓本“能不懷媿”，宋刻本“媿”作“愧”；魯銓本“苟能超然”，宋刻本“苟”作“若”；魯銓本“敬歎厥美”，宋刻本“歎”作“贊”、“厥”作“德”。《命子》詩，魯銓本“逸虬撓雲”，宋刻本“撓”作“遶”；魯銓本“蔚蔚淇柯”，宋刻本“蔚蔚”作“鬱鬱”；魯銓本“字爾求思”，宋刻本“爾”作“汝”。

卷二《九日閑居》詩，魯銓本“空服其華”，宋刻本“其”作“九”。《歸園田居》詩，魯銓本“榆柳蔭後簷”，宋刻本“簷”作“園”；魯銓本“復得反自然”，宋刻本“反”作“返”；魯銓本“隻雞招近局”，宋刻本“局”作“肩”；魯銓本“日莫巾柴車”，宋刻本“莫”作“暮”；魯銓本“開逕望三益”，宋刻本“逕”作“徑”。《遊斜川》詩，魯銓本“願君謝諸子”，宋刻本“願君謝”作“願言誨”。

卷三《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魯銓本“在目皓已絜”，宋刻本“絜”作“結”。《己酉歲九月九日》詩，魯銓本“衆蟬無歸響”，宋刻本“衆”作“哀”；同詩魯銓本“蓼雁鳴雲霄”，宋刻本“蓼”作“燕”。《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

魯銓本“斗酒散襟顏”，宋刻本“斗”作“升”、“襟”作“襟”。《飲酒》詩，魯銓本“山氣日夕佳”，宋刻本“佳”作“嘉”；同詩魯銓本“日沒燭可炳”，宋刻本“燭可炳”作“獨何炳”。

通過上述異文的列舉，確證蘇寫宋刻原本與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並非同一版本。

（二）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中附校語，而所校之異文恰同於魯銓本

卷一《時運》詩，宋刻本“偶景獨遊”，校語云“景”一作“影”，魯銓本即作“影”；宋刻本“洋洋平澤”，校語云“澤”一作“津”，魯銓本即作“津”；宋刻本“但悵殊世”，校語云“悵”一作“恨”，魯銓本即作“恨”。《榮木》詩，宋刻本“嗟余小子”，校語云“余”一作“予”，魯銓本即作“予”。《贈長沙公族祖》詩，宋刻本“載警秋霜”，校語云“警”一作“驚”，魯銓本即作“驚”。《酬丁柴桑》詩，宋刻本“爰來爰止”，校語云後一“爰”字一作“官”，魯銓本即作“官”字。《勸農》詩，宋刻本“桑婦霄興”，校語云“興”一作“征”，魯銓本即作“征”字。《命子》詩，宋刻本“紛紜戰國”，校語云“紛紜”一作“紛紛”，魯銓本即作“紛紛”。

卷二《神釋》詩，宋刻本“萬理自森著”，校語云“理”一作“物”，魯銓本即作“物”字。《歸園田居》詩，宋刻本“我土日已廣”，校語云“土”一作“志”，魯銓本即作“志”字。《遊斜川》詩，宋刻本“氣和天惟澄”，校語云“惟”一作“唯”，魯銓本即作“唯”字。《乞食》詩，宋刻本“主人諧余意”，校語云“諧”一作“解”，魯銓本即作“解”字。《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宋刻本“炎火屢焚如”，校語云“如”一作“和”，魯銓本即作“和”字。《答龐參軍》詩，宋刻本“輒依周孔”，校語云“孔”一作“禮”，魯銓本即作“禮”字。《於王撫軍座送客》詩，宋刻本“懸車斂餘暉”，校語云“車”一作“崖”，魯銓本即作“崖”字。《贈羊長史》詩，宋刻本“九域甫已一”，校語云“已一”作“爾去”，魯銓本即作“爾去”。《歲暮和張常侍》詩，宋刻本“窮通靡攸慮”，校語云“攸”一作“欣”，魯銓本即作“欣”字。《悲從弟敬德》詩，宋刻本“雙泣委空館”，校語云“泣”一作“位”，魯銓本即作“位”字。

卷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宋刻本“寒竹被荒蹊”，校語云“竹”一作“草”，魯銓本即作“草”字；“所保詎乃淺”，宋刻本校語云“乃淺”一作“成淺”，魯銓本即作“成淺”兩字。《己酉歲九月九日》詩“園木空自凋”，宋刻本校語云“木”一作“林”，魯銓本即作“林”字；《飲酒》詩“達人嘆相持”，宋刻本校語云“相持”又作“自持”，魯銓本即作“自持”二字；同詩“此還有真意”，宋刻本校語云“還”一作“中”，魯銓本即作“中”字；同詩“人當解其表”，宋刻本校語云“其表”一作“意表”，魯銓本即作“意表”二字。《責子》詩“但覓梨與栗”，宋刻本校語云“覓”宋本作“念”，魯銓本作“念”字。

知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在刊刻中，參校了蘇寫宋刻原本，佐證陶集當刻在紹興十年之後。

（三）兩本校語相同者

卷一《贈長沙公族祖》詩“諧氣冬暉（宋刻本暉作輝）”句，“暉”（“輝”）字下均同出校語云：“宋本作暄。”卷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鳳於規林二首》詩“一欣侍溫顏”句，“顏”字下均同出校語云：“一作清。”同詩“指景限西隅”句，“西”字下均同出校語云：“宋本作四。”同詩“延目識南嶺”句，“識”字下均同出校語云：“宋本作城。”同卷《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投冠旋舊墟”句，“墟”字下均同出校語云：“一作廬。”同卷《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地為罕人遠”，宋刻本校語云“罕”一作“幽”，魯銓本校語同；同卷《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宋刻本“荊扉晝常閉”，校語云一作“荆門終日閉”，魯銓本校語同；同詩“深得固窮節”，宋刻本校語云“深”字“宋本作謬”，魯銓本校語同。同卷《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果菜始復生”，宋刻本校語云“菜”一作“藥”，魯銓本校語同。同卷《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開春理常業”，宋刻本校語云“開春”一作“春事”，魯銓本校語同。

知兩本參校過同一部陶集刻本，當即宋庠本，如卷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鳳於規林二首》詩“延目識南嶺”句，“識”字下均同出校語云“宋本作城”，便是明證。

綜上，通過校勘印證了兩個簡短的結論：其一，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的刊刻，曾參校過蘇寫本的宋刻原本，將兩本不同的異文隨文列出，從而佐證刻於紹興十年之後；其二，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和蘇寫本的宋刻原本都參據過宋庠本，所以出現兩本校語相同的現象。

三、結語

本文通過考察，認為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存在着作偽的痕跡，即在“曾紘書”後妄刻“刊”字冒充北宋宣和曾紘本，在後世流傳過程中運用紙張染色做舊來混淆原紙和補紙的區別，掩蓋卷端挖補的缺憾。通過刻工和版式及字體的比較分析，確定此陶集應出於明州所刻。同時比對了此本與蘇寫宋刻原本的版本關係，斷定此本當刻於紹興十年之後的紹興年間，兩本均曾參校宋庠本。

注釋：

- ① 參見焦從海《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傳考》，載《文獻》1985年第3期。
- ② 另日本學者橋川時雄撰有《陶集版本源流考》，1931年鉛印本。在宋刻陶集版本研究方面則當屬此三位學者，趙萬里釐清了陶集的版本鑒定問題，成為至今可靠的鑒定意見；郭紹虞則重點梳理了宋刻陶集版本的文獻記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而陳杏珍則深入討論了宋刻陶集的版本，提出並初步解決了諸如“曾紘書刊”等富有啟發性的問題。
- ③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孫猛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8頁。
- ④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清代卷》第7冊第427頁，中華書局，2006年。
- ⑤ 楊紹和《楹書隅錄初編》，《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清代卷》第4冊第500頁。

- ⑥②③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第942頁。
- ⑦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21—22頁。
- ⑧ 陳杏珍《宋刻陶淵明集兩種》，載《文獻》1987年第4期，第209頁。
- ⑨ 丁延峰《海源閣藏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71—172頁。
- ⑩ 宋紹熙三年曾集刻本《陶淵明詩》一卷，《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後有曾紘書文一篇，疑即據此文抄補。
- ⑪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0頁。
- ⑫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第427頁。
- ⑬ 陳杏珍《宋刻陶淵明集兩種》，第208頁。
- ⑭ 郭紹虞《陶集考辨》，載《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4—275頁。
- ⑮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11頁。
- ⑯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本，第3頁。
- ⑰ 鄧小軍《陶集宋本源流》，載《詩史釋證》，中華書局，2004年，第90—94頁。
- ⑱ 丁延峰《海源閣藏書研究》，第172頁。
- ⑲ 參見李國慶編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書年譜》，黃山書社，2000年，第236頁。
- ⑳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第21頁。
- ㉑㉒ 陳杏珍《宋刻陶淵明集兩種》，第210頁。
- ㉓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卷六十末有盧欽跋，云：“《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與國家圖書館藏編目8576一部係同一部書。
- ㉔ 冀淑英《冀淑英文集》，陳紅彥整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207頁。
- ㉕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6頁。
- ㉖ 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明州刻遞修本《文選》，有“施章重刁”，而此本避諱至“慎”字止，知除與刻《文選》初版外，尚參與紹興二十八年至孝宗朝的補版工作。
- ㉗ 綫裝書局2000年據此本影印出版，本文所依據的本子的即綫裝書局影印本。
- ㉘ 錢曾撰，管廷芬、章鈺校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清代卷》第5冊第183—184頁。
- ㉙ 錢謙益撰，錢曾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81頁。
- ㉚㉛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464頁。
- ㉜ 鄧小軍《陶集宋本源流》，第115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